

張季鸞著

季鸞文存
(下)

附

錄

列寧逝世

（十二年作，載上海中華新報）

列寧逝世之報，將永爲人類歷史上特筆大書之事，何則？由一種意義言之，彼乃千古之一人也。

歷史上所謂大英雄，其事業往往僅代表一民族或一國家爲止，而列寧之理想，則爲人類的，其事業則世界的。列寧以前，固亦有若干世界主義之理想家，然輒空言而止。列寧則獨能於世界一大君權國中，除破壞其政治組織之外，並將其社會組織經濟組織根本推翻。創空前未聞之勞工專制政體，以外抗強鄰，內壓政黨，巍然爲世界資本主義之一敵國，以至今日。就此而言，千古一人而已。

列寧之友滿天下，其敵亦滿天下，然而無論其友其敵，對於列寧氏個人之人格毅力，無不稱讚之者。誠以彼之革命事業，純由一種理想而來。彼目中除資本階級與勞工階級之對抗的事實以外，不見有國家之境界。彼之理想，在消滅私有制度，創勞工專政之世界聯邦。是以雖反對其主義者，而視其不屈不撓之精神，與其淡泊勤懇之態度，則無不傾服之。要言之，彼爲真有理想而真行之者。彼之事業，實爲人類而非爲自己。且非僅爲俄羅斯；就此點論，亦可謂偉大之人矣。

自列寧亡命瑞士，對俄軍宣傳「敗北主義」之時，以及其假德人之力密送回國，與夫成功以後之大殺大戮，及其悍然廢私產，廢國債，發動世界革命及民族解放，當是時也，列寧如彗星之現於天空，世界視聽，幾爲其一人所亂。或頌爲神聖，或惡如蛇蝎，

或目爲英雄，或證以魔怪；即遠東之人，亦震驚殊甚。雖然，列寧之真價值真勢力，經久漸明，評論亦漸異。蓋俄國革命之一大悲劇，漸次閉幕。而代以平和之新建設，向之徒恨列寧或嘲笑之者，至是乃信其非徒爲大言之惡人，而同時共產黨人所信之世界革命，並未勃發。俄國內部於試驗數年之後，亦不得不改用新經濟政策，承認某種程度之私有制度。是以蓋棺論定，則於此六七年間，世界多誤會列寧，列寧亦未嘗不誤會世界。列寧所成就之事業與其人格，雖永遠存在，然而人類之歸宿如何，依然爲一謎語，並未爲俄國大革命之悲劇所解。由此而言，則因俄國革命而死之數百萬資產知識階級之俄人，可謂爲列寧試驗之犧牲，而永爲人類之悲劇也。

俄國今日，已非純粹之共產主義，其經濟設施，步步近於國家社會主義。蓋農民除貢稅之外，可得有其收穫之餘。國內商業，允許私有。工商支付，亦用貨幣，惟大事業及對外商業，爲國有而已。其與普通之國家異者，則勞工專政。換言之，即共產黨專政。共產黨人本爲無產階級，故質言之，爲無產階級之專政；世界雖大，無其兩也。又紅俄尚有一大特點，則至今守對外不侵佔之宣言。對於近東中東之弱小民族，表示同情，促其與西歐之帝國主義相抗。土耳其之復興，不得謂無俄國之力也。依另一種觀察方法，俄國已身即爲一種侵略者。蓋宣傳革命，欲破壞各國現有之組織是。然此點與帝國主義之性質要爲不同，其防禦之方法亦異。故就外交論，俄國要爲開世界之一新紀元也。至於列寧逝後之俄國如何？在不諳俄事之吾人，應勿爲倉卒之判斷。雖然，有可言者，蘇俄制度必不隨列寧之逝而遽變，蓋其制度重心在共產黨幹部。列寧自前年以來久不聞

政，近方新布聯邦憲法，且國內國外，俱無勁敵。故列寧雖死，其他幹部，尚可運用而維持之。然此就目前以言，非所論於十年二十年之後也。

抑列寧者時代之產物。其理想與事業，莫不為時代所造成。蓋有歐洲之資本文明及其弊害而後有共產主義。有俄國之惡政及貴族獨占之經濟制度，而後有革命之可能。且必遇歐戰之大爆發，而後列寧得實行之機會，是以列寧之事業果有功，人類之功也；果有罪惡，時勢之罪惡也。因之，列寧六七年來之試驗，人類歷史之重要試驗也。今列寧逝矣！然而人類之趨向果何如哉！

新聞報三十年紀念祝詞

（十二年作，載『新聞報三十週年紀念冊』）

民國五年余曾任新聞報北京通信事，故於新聞報三十年紀念較之普通同業尤不勝欣祝之意。居嘗評論，以為中國成功之報紙惟有一新聞報，蓋中國有報數十年，興者仆者數百社，而視為一種純粹商業，不假政治之力，不仰人資助，獨立經營以維持而發展之者，惟有一新聞報，且中國報界之淪落甚矣，自懷黨見，而擁護其黨者，品猶為上，其次，依資本為轉移，最下者，朝秦暮楚，割售零賣，並無言論，違言獨立，並不主張，違言是非，而新聞報者獨能發揮其在商言商之主義，不求津貼，不賣言論，不與任何特殊勢力締結關係，惟憑其營業能力，步步經營，以成今日海內第一之大報，此誠難能而可貴也。抑察新聞報之發達，皆汪君漢溪之力，汪君不問政治，不兼他業，惟專心一志經營報務，其勤慎精細久而不懈，全國無第二人，而其編輯部諸君皆正人君子，勤事勵

行，爲同業範，同學李浩然君自入是報，亦近十年，古有隱於市，隱於朝，浩然乃隱於報社，終年服務，恬退自甘。夫一事業之成功，皆賴主其事者不斷的注其心血精力，積尺寸之功，以成山嶽之大。新聞報之有今日，乃汪君等三十年之辛勤致之，非偶然也。雖然，新聞報在社會之功罪爲何如，吾嘗審思，以爲中國報紙無功可論，惟視其罪之大小及性質何如。新聞報者，雖不敢言功而可告無罪者也。新聞報之言論未必無誤，然非有所私圖，其紀事未必盡確，而絕非故意爲之。換言之，縱有偏，而非私，縱有謠言，而非自造。滔滔天下，新聞報實勝一籌也。雖然，中國民族方遇空前絕後之大變局，故中國報紙不久必須經過大革命。由今論之，新聞報之地位最適於爲革命之先鋒，亦最有成功之希望，蓋報紙性質，一面應作商業經營，一面則對於國家社會負有積極的扶助匡導之責任，新聞報者，第一層已著成功，第二層尚有餘地，蓋今日態度，只爲反映社會一部分之現象，尙少扶助匡導之事，社會白，則新聞報白，社會黑，則新聞報黑，社會呻吟，則新聞報呻吟矣，社會疲倦，則新聞報疲倦矣。故新聞報於無成見於忠實紀載一層，可謂無負社會，所以大受社會之信任，然只此而止，其奈此混亂之新邦何乎！今者，其他報紙本身基礎且未鞏固，無可求其改良，深望新聞報以此三十年紀念之機會，另定第二步營業計畫，以應時勢之要求，客觀紀載，愈求其詳，主觀論斷，更期其勇，廣攬專家，分爲部類，一如歐美日本大報之組織，公共問題必有主張，社會現象凡百不漏，蓋汪君勿僅自誇其不黨，當發願使中國有智識者俱變爲新聞報黨，新聞報所善者，國民俱善之，新聞報所惡者，國民俱惡之，新聞報所提倡或排斥之事，國民皆提倡或排斥

之，然後新聞報可爲中國新聞之大王，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豈僅吾儕同業之光榮已哉，勉矣汪君，行且於三十五年或四十年紀念時更載筆爲我東方泰晤士之主人賀也。

國聞週報十周紀念感言

（二十一年十二月十日作載國聞週報）

民國元年，余與胡政之兄同服務於上海民立圖書公司。二年，余由北京出獄歸上海，落拓無聊，政之時主大共和報，余遂亦任譯員。復同於中國公學授課。民五以後，又同在華北報界。八年，余再居上海，主中華新報，政之亦自歐洲歸來，創設國聞通信社。館址爲鄰，而居家同里，如是者且四五年。迨十三年冬，余失業北來，而政之先亦移居北京，仍朝夕過從，十五年秋，更同辦大公報，日月匆匆，已六年矣。二十年來，同業友人，或死或散，或改業爲官吏，其慘者，殉身國事，不可復見。獨與政之蹤跡不離，亦都不改業，年來且同服務於一報，遇合之佳，生平無二也。國聞週報原爲國聞通信社之附屬事業，創刊之時，余亦在滬，深贊賞之。十三年，吳達詮兄與政之及余，議發起新聞事業，並日報週報通信社而一之。達詮爲東京留學時代之友，與政之且同學。民國以來，達詮投身於財政經濟界，而余等業報，跡疏情親，國士相許，達詮於新聞事業，見解獨卓，興趣亦厚，以爲須有獨立資本，集中人才，全力爲之，方可成功。十三年在滬所議如此，然未幾因余北來，議遂中輟。迨十四年冬，國聞通信社營業不支，政之擬停辦，達詮惜之，並商於余，於是舊議復活，擬先擴充國聞週報，余允贊助而尙未能。然因達詮之主持，國聞社事業基礎，自是固矣。十五年，北局大變，余滯留津門，傍

惶無所之，達詮政之乃勸余歸滬，主辦國聞週報。余病其爲週刊，不足滿勞動之慾，以爲必兼辦日報，庶幾可以迴旋也。然政之與余，辦報皆久，飽經世變，如鳥驚弓，設非適有大公報停辦之事實，及進行接辦之利便，余大抵再作上海人矣。大公報既續刊，國聞週報遂亦移津發行，而余精力不足，於週報竟無貢獻。年來此姊妹事業，較見發展，今週報忽已屆十週年紀念之日，回首前塵，萬端感慨，用述吾數人合作之往事如此。夫民國逾二十年矣，言論救國，其效爲何？破碎河山，窮愁民衆，悲愧之情，如何可已！敬告讀者！吾儕尙將加倍努力以報社會，並望讀者教誨之！兼致意全社同人，愛國自愛，努力前途，俾吾日報週報與民國創業同底於成功！早衰如余，仍將與達詮政之爲全國新興言論界之老兵弱卒，爲民族生存之大問題而隨同奮鬥也！

歸鄉記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載國聞週報）

今秋我因先父百年紀念，與先母三十週忌辰，回籍謁墓，承海內諸前輩諸親友同情，賜以紀念文字。國府諸位先生，也特有文字之惠贈，外國使節之賜教者，有蘇聯大使，日本公使，而日本報界二三老友也有所惠贈。現在謁墓歸來，爲酬答各方同情，義應有所報告，除關於旅行見聞之新聞性質的紀述，已見大公報外，謹撮述個人還鄉所經歷及感觸者，藉本報發表，權做報告海內親友的一封信。

我的家世・我的思想

我想應該從我的家世與思想說起，十月間，榆林各界給我開歡迎會之時，我大致說

過這一段話：

我對於此次回鄉謁墓，應該自己加一點說明。我對家庭的觀念，一方面說，很重，一方面說，也很輕。爲甚麼很重呢？就是一個老孤兒，父母去世早，罔極之恩，無法報答；加以家運甚壞，人口單薄，自己常常感到嚴重的責任，與孤獨的悲哀，多年不能回家看看，常常不安，近年尤甚。對國家社會一點未盡力，更感到公私兩負，有背親恩。爲甚麼說很輕呢？我從沒有治產求富的一套觀念，事實上我父子兩代，沒有增加過財產，只有減少些，現在所住的一院舊屋，還是乾嘉時代的祖產。現在是甚麼時代！中國不保，那裏說到家庭？大家不得了，一家怎樣獨樂？所以我的思想，是贊成維持中國的家族自治，但是要把牠擴大起來。擴大對父母對子弟的感情，愛大家的父母與子弟。從報答親恩，擴大而爲報共同的民族祖先之恩。這種思想，是很對很需要的。同時，應該排斥只知自私的錯誤的家族主義，不要只求自家繁榮，甚至於不惜損人利己。

我的思想，大概在這一段話中。我父親翹軒先生是一位老進士，一世清廉剛直，庚子冬六十六歲上，病故在濟南。那時家眷住寧陽縣，我只十三歲。得訃之後，同先三兄大舍姪，即日奔喪，時值殘臘，在大風嚴寒中，騎驢旅行三日，趕上啓棺含殮，哭拜最後的遺容。這一幕悲劇，三十幾年來，常常憶起，常常悲痛。先母王太夫人是繼配，是一位極慈祥平和的女性。母家住山東沂水縣，先父去世後，一貧如洗，多勸她就住在山東，先母不肯，一定要扶柩歸葬。領着我們小兄妹三人，到沂水拜別了先外祖父母。辛丑冬，帶全家回榆林，一路的困難，不必說了，到家即發生生活問題。全家箱篋中，只

有幾只元寶。有一處夥開的商業，被人乾沒，成了訟案，先母自己上堂，而命我早出遊學，艱難家計一身承當。又死了我一個妹妹，先母身心憔悴，遂以不壽。我最後見面，是清光緒三十年正月。我又要到三原宏道學堂，臨行拜別，先母倚窗相送，面有笑容，誰知即此成了永訣！到校兩月，即接到訃聞，待我奔喪到家，只見到寺中停寄的薄棺一口！先母死年，才三十七歲，今年若在，不過六十七歲，這尤是我終天大恨，三十年來，時時想起，不由得感到無可如何的悲哀！我的家世，大概如此。這二三十年中，兄嫂皆故，男女兄弟共八人，現在只餘我與季妹。姪男三人，只大姪健在。家庭種種的不幸，常常使我感到對先世對父母的重大責任。我的人生觀，很迂淺的。簡言之，可稱為報恩主義。就是報親恩，報國恩報一切恩！我以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責任問題，無權利問題，心安理得，省多少煩惱。不過我並無理論，不是得諸注入的智識，是從孤兒的孺慕，感到親恩應報，國恩更不可忘。全社會皆對我有恩，都應該報。現在中國民族的共同祖先，正需要我們報恩報國，免教萬代子孫作奴隸！人們若常常這樣想着，似乎易於避免墜落，這是我的思想。

故鄉給我的同情

國慶日傍晚，我們全家到了多年不見的榆林城。榆林附近，是一片沙漠，我看見多年不見的沙邱，反感到一種愛慕。夕陽將下之時，隔着榆谿河，遠望沙邱起伏，一片通明。目力所及，有看不盡的烽墩，沙隨風舞，猶如海中波浪一般，這是怎樣雄偉的風景呀！離城二十里，即遇故友新知之來迎。師長井崧生先生，是辛亥前的舊友，令弟勿幕

，留日同學，親如兄弟，他是辛亥革命的陝西領袖，民國七年，遇害殉國了，崧生在榆林二十年，雖音信少通，但常常關切我，私交極厚。前年我買墳地，承其親自調查多日，情尤可感。是日崧生偕財政專員杭勁夫先生及同學至友張翊初景岩徵兩先生遠道來接我，及到城邊，天已昏黑，有一般親朋與本城諸位當局之候迎。我在萬分感激中，步行入城，夾道人滿，擁擠不通。故鄉人們，給我這樣同情，將使我永遠感愧。

先父誕日，是陽歷十二，剛剛趕上。是日在戴興寺設位致祭，收到的紀念文字數百件，陳掛寺中，承全城親友與各校學生，參加行禮，如此三日。戴興寺是明代武世家戴氏私祠，戴氏在明代以武職顯者十餘代，都是效力邊防的。我們先世幾代，常在該寺做佛事，所以論公爲榆城名勝，論私有幾代因緣。紀念日既過，全家謁墓，準備立碑。從蘇州運回的碑，是承傳宜生先生派副官張君耐寬從包頭河上冒險運來。其到府谷縣亦爲十月十日，但其後之陸行費時一月之久。榆林各界，爲先父特贈一神道碑，與墓表同日揭幕。我竭誠致謝，略述先父晚歲思鄉，求歸不得，做官多年，無補桑梓，現在承故鄉父老這樣褒揚，先父在天之靈，一定萬分感激；至於所給予不孝個人之深厚的同情，惟有此後更謹慎地做人，勇敢的服務以爲答報。誠然！這是我此次歸鄉後之根本感想，對於故鄉的廣大同情，此後將如重負在身，惟有勉力在服務社會上圖報。

陝北邊僻，墓表墓誌，皆不常見。此次先父墓表，太炎先生之文，右任先生之字，與蘇州之精刻，故鄉各界皆認爲難得，所以閏動一時。社會最近，頗不講此種舊事，我也無意去特別提倡牠，在我只是行其心之所安。本來報恩之道，人各有所宜，不必一律

，我只希望大家都親親而仁民，推廣骨血的至情，涵養愛人愛國的摯感。我想這或者不是違背時代潮流。

我在家鄉住一個半月，享受了多年未經之舒適生活。一院舊房，日光充足，空氣新鮮，而且榆林飲料是最好的泉水，所以極適於健康。里居期內，不縈心職務，早起早睡。假若不是家內殤了一個有望的姪孫，假若陝北是安居樂業的樂土，我將有最幸福最愉快之感了，陝北農村破產，秩序紊亂，但在都會的榆林，還看不出來。一個多月中親友歡譟，忙碌異常，受不盡的歡迎與招待！我這短期的故鄉生活，在我雖充滿了感謝滿足之情，但同時認識在陝北人中，這完全是一個例外。

居鄉月餘的感想

我在鄉間盡做些個人私事，訪尋老親戚，謁師會友，業師田善堂先生，年近八十，今還健在，登堂拜見，悲喜交加。我此次曾謁過生平未到的老祖塋，在榆谿河西的沙中，差不多快要埋沒了。最欣幸之事，是在族兄處尋到一部分家譜。知道原籍是米脂縣，明嘉靖年間一位祖先來榆林衛從軍，轉戰陣亡，這一支就做了榆林人。家譜上有幾代都是從軍。明末一代外祖是侯總兵，他是李自成之役，守城殉難的一員大將。清代以後的祖先，也是武職多。我現在從先父起，可以往上數到十三代，都清清楚楚了。這是此行在辦理私事上最有意義的收穫。

游覽之事不多，只是曾偕崧生諸位，登過鎮北台。此台在城北十餘里，爲明時駐兵防禦的重地，其下爲款貢城，是當時漢蒙互市之地，附近有雄山寺，爲榆林勝景，倚山

臨河，岸上刻滿了明清兩代名人詩詞，先父有贈劉總兵厚基七律兩首，也鐫在寺壁上，是自己寫的。先父手筆在榆林刻石不少，此次拜觀幾處，不勝嚮慕之情。在鎮北台上，四面遠望，但見成列的烽墩，向東西兩方，無限展開。向西一直通寧夏，向東到黃河，看這四百年前軍事上的偉大設備，令人想見祖先們保邊衛國的辛苦。再往上想，從周秦以來，吾族祖先們在這萬里邊塞之間，不知流了多少頸血，受了多少艱苦！一代一代地這樣守禦着，奮鬥着，榮枯興衰之間，不知犧牲了多少仁人志士！我在鎮北台，對着荒沙殘照，不由得泛起種種思潮。因為現在國難當頭了，這種外患，恐怕是從幾千年來祖先們從未遭遇的嚴重問題。自東北淪陷以來，數千里蒙地，刻刻可以不保，那麼這沿邊一帶，又恢復到明代的重要！我對榆林學生常說到此點，從前是偏僻內地，現在又成國防前線了，但是我們有甚麼設施呢？除過沙漠之外，只有些殘破窮困的鄉村，囚首喪面的農衆，這種事實，是一刻不可放任的了。我在榆林職業學校曾對學生說過，我們要立志把沙漠變成黃金。這就是說：要趕緊興產業，把這一帶邊地建設起來。現在的陝北匪亂，我想是一時的現象，如何建設，纔是根本問題。

在榆林聽見友人們陳述各縣許多苦況，大概情形，已在大公報發表，不再贅言。總之目前在最窮困紊亂之時，不過我想這畢竟有解決之日，因為現在省府已一切負責，鴉片也禁止了，此後一定漸有轉機。最要緊的還是在如何興產業，培人才！

近年西北建設，高唱入雲，但是大力量還沒有用上，就榆林一帶說罷，有牧畜皮毛鹽鹼之利，有煤有水，人民有工藝才，許多工業可以辦，許多學校可以設。更可注意的

，陝北廣大的青年層，在將來甚有希望，大概皆聰秀而勤樸，體質亦好，對國事熱心。陝北中學生誤投共黨的不少，但原則上責任不在本人。我在西安慶祝剿匪勝利大會上，被邀請話，有這樣幾句：「我們可惜青年入了歧途，但是我們應該指示他們正途何在。這幾年的各地不良行政之下，假若有青年問我：現在的狀態，是否爲正軌？青年們應該怎樣效力？我實在答不出來。」誠然：凡熱心青年，都是民族的好份子，問題在如何親切地領導他們，使得成爲有用之才。就陝北說：這幾年民窮財盡，官貪紳劣，青年們國憂家難，重重苦悶，倘不頹唐消極，便誠恐思想惡化。此次榆林中學學生給我出了多少問題，有一題是人在受非法壓迫窮極無法之時，是否應該反抗。當時因題多天晚，沒有說到這裏，現在回想起來，却不易作答。譬如那不種煙也逼攤煙款的苛政，論情論法，都可以反抗，但是平和的合法的反抗，怎樣實行呢？我想全國問題，都是一樣。只要政治好，軍紀佳，賦稅公允，一面竭力培植人才，共同發救國宏願，領導青年前進；我想不但能解決了思想惡化問題，一定能喚起青年的志氣，一致跟着走。我此次歸陝，特別對青年問題感着興味與責任。我不是特別注重青年職業的出路，此次在榆校答覆問題，曾說到：「只說青年無出路，好像中年老年或幼年都有了出路。現在問題，是大家無出路，不是某一部份人無出路。我們要爲整個民族，爲一般同胞，求得出路，我們自己的出路，就在其中。」這是我向來的看法，小飯碗不成問題，要鞏固大家的大飯碗。現在，亡國就是砸大飯碗，你看東北的墾民，無端剝奪了墾殖權，華人商業，完全一落千丈，可知現代的亡國，比過去更苦，不但政治上失自由，並且經濟上作奴隸。所以中國

的職務是喚醒並領導青年，共同發願，以維持民族生存爲惟一的目標！換句話說，就是維持大飯碗，尋求祖出路。再專談西北問題，就是盼望政府與海內實業界，對此國防地帶，應該迅速地加上一點重量，先在主要各地辦一點工業，提倡牧畜與農業，一面設二三完全的專科學校，多多培植一些人才，同時設法獎勵邊地優秀青年，多考入都會專科學校。我想開發地方的根本條件，是培植人才。此次在榆林臨行，與商學界友人發起了一個小小的獎學基金，友人們都熱心贊助，但是財力皆微，現在只有五千餘元，我以後自己定陸續盡力於這個事業，更盼海內賢達們同情此舉，賜以援助！同時望西北各都會，都有這樣設施，務必設法扶持天才的寒士，爲地方多造就些專門人才。至於提倡工業之事，惟盼大力者加以注意，更非吾輩力之所及了。

我於立碑後約一星期，在親友們盛大歡送之下，再辭了故鄉。臨行叩別先影，不禁感到惜別的酸辛。現在意思二三年後，汽車路如通，要常回故鄉住住，但不知是否爲事實所許。此次最抱遺憾的，是未得到最窮的鄉村去看看。榆林以北沿邊的農村生活最苦，本來無食無衣，還要受煙款剝削。還有強迫放高利貸的，春間強貸以一元，秋後要鴉片鮮漿七八兩，村民忍從，不敢聲張。這些最苦的農村實況，惜乎未得親睹，至於途中所見，則蝗蝻蝻一帶，已充分表現亂世災民的景象。村民大抵逃空，只餘破屋，這一帶已是匪區，常常越貨殺人。此次離榆東來，是走綏德一路，到四十里舖，正遇行刑一匪，係兩日前由村民自己綁送來的，此人曾做過十幾起殺人案。是晚到綏德，聞城南四十里處，有一連軍隊，正與匪作遭遇戰。綏德南鄉若干村，久成匪區，已在分配土地。總

之，現在陝北正赤化蔓延，到處恐怖，大概明春纔能改觀。綏德黨政軍各界與幾位教育界友人，挽留翊初與我，住了一日，全城表示歡迎。各界在師範學校開會設議，在地方不靖之時，受綏德父老的隆重招待，更覺不安。我在會場致謝了幾句話，又招幾位學生特別談了一談。榆林綏德各男女校學生，都關切國事甚為熱烈，學風一致地樸厚，求知之慾甚為發達。我現在見不着這些青年，願遙為他們祝福。從綏德東行，兩天到河岸，是吳堡縣境，受縣長陳先生招待，知道該縣近日尚稱平靖。過河行一百里，到離石縣，即乘太原綏署秘書長賈煜如先生派來迎接之汽車而赴太原，陝北旅行，以是告終。在長安住一星期，有些印象，已載大公報，我這裏再感謝長安各界對我的厚意。

現在再寫幾句話，結束此文。我未回鄉之前，對友人說過，將以此次謁墓立碑，結束前半生，以後將從頭努力。此次回鄉，對家事實際無所布置，但精神上感覺了事一宗。從此將仰賴先父母的呵護，牢守着海內前輩故鄉親友所給的同情，在個人修養上在事業上，都想新求一些進步。這一篇拉雜無章法的紀事，只是當做報告各地親友的一封信。這點淺陋的人生觀，迂闊的舊思想，和一些關於西北邊防的祈求，若干對青年問題的認識，倘能供本報一般愛讀諸君萬一的參考，那更是榮幸之至了。此文見報，正是二十四年元旦，謹祝全國同胞，發願救國，各求進步，不肖謹願隨同胞之後塵！

我們有甚麼面子？

（二十四年一月十七日、獻國聞周報）

半月前，在北平同二三老同學縱談時事，引起不少感慨。我記得曾說到：自己覺得

在報界多少年，眼看着國家地位至此，還在做記者，實在沒有面子。同學某君，稱許此言，說這便是一種覺悟。歸津以後，屢次想到這一段話，現在具體的多寫幾句，發表給週報讀者諸君。

近來從心坎裏想罵人，但有條件，是從自己罵起。譬如就我們說，自民國以來做新聞記者，這多年在天津做報，朋輩們都說是成功，報紙銷得，也受重視，在社會各方庇護之下，何嘗不儼然是中國大報之一；但在九一八後之中國，清夜自思，事前有何補救？事後有何挽回？到現在四省沈淪，而大報館還是大報館，老記者還是老記者，依然照常的做所謂輿論的指導，要用春秋論斷，除恬不知恥四字而外，恐怕任何批評皆不適宜。同時再從一方面講，這樣大報，辦得穩嗎？老記者的鐵飯碗，有保持的把握嗎？我敢斷言：絕對不穩，毫無把握！甚麼理由，大概用不着講：總括一句話：國家不穩，甚麼事業能穩？國家無把握，甚麼事業能有把握？豈但天津，處處一理，豈但報業，業業皆然。再進一步說，豈但自己維持大報無把握，改行能行嗎？遷地有辦法嗎？逃到鄉下不做事，能安全嗎？祖宗墳墓，能保得住嗎？妻兒老小自己能保護嗎？這樣推論下去，必然要達到唯一的結論，就是在國家現狀下，一切事業，都算無基礎，一切生命財產，都是不可靠。北方有句俗話：不能混。國家現狀就是這樣，中國人不能混了。以四萬萬人的大國，落到這種不能混的地步；而我們這樣，賴國家栽培受過若干教育，仗社會優待，吃過多年飽飯的人，一面束手無策，一面依舊寫些一知半解的文字，號稱做輿論的工作。不細想則已，細想起來，焉能不羞愧欲死！